

疆界 2

boundary 2



国际文学与文化

王逢振 选编

132 boundary 2 / Fall 2001

To be sensual I think, is to respect and rejoice in the
of life itself, and to be present in all that one does, for
loving to make of bread. It will be a great day
dentist to eat bread again, instead
moving rubber that we have
an or. Someth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have
American
fountain of their
cipation, of any coun
cult. The person who distrust
this touchstone can be only
not know about Ne
know about

疆界2

boundary 2

國際文學研究

創刊 1998



人間文學館藏

疆界2

boundary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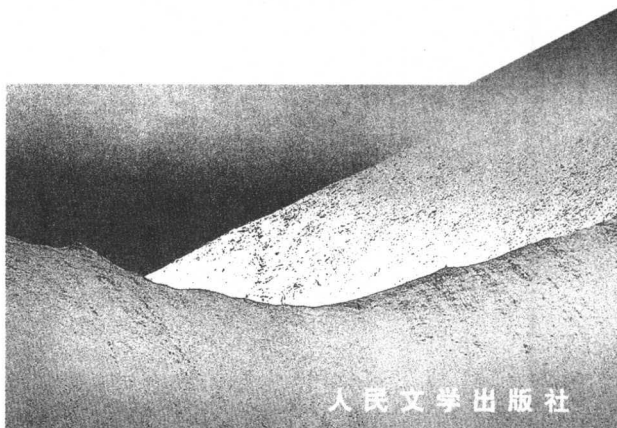
国际文学与文化

王逢振 选编
蔡新乐 等译

10

133

20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Boundary 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 2001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疆界 2—国际文学与文化·B/王逢振选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
ISBN 7-02-004828-5

I. 疆… II. 王… III. ①文学理论—美国—文集
②文化理论—美国—文集 IV. ①I0-53②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6721 号

责任编辑: 吴继珍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李博

疆界 2—国际文学与文化·B

Jiang Jie Er—Guo Ji Wen Xue Yu Wen Hua·B
王逢振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828-5

定价 27.00 元

前 言

《疆界 2》中文本第一卷去年出版之后,许多朋友表示赞赏和鼓励,认为它对促进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希望我们继续下去。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愿意尽可能做好。

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好心朋友的不同意见。他们在支持我们的同时,建议我们集中选择关于纯文学研究的文章。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只是一时的时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纯文学研究或审美研究。这种意见或许有其道理。但是,《疆界 2》毕竟是一本关于国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杂志,由于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发展,即使文学研究也多采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因此我们的选题不可能超越杂志本身而专门集中于所谓的纯文学研究。

其实,这些朋友的意见背后是一种担心,担心“大”文化研究正在形成强势,会压制甚至取消传统的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这种担心一方面表明了文化研究的力量和挑战,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文化研究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研究由文学研究发展而来:在批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用文学研究的方法分析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品,像分析文学文本一样,把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品当作文本,以各种批评理论进行分析。因此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文化研究的对象非常广泛,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贴近现实生

活,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发展迅速,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但是,文化研究并不排斥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它们仍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文化研究大大促进了文学研究,由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视域,文学研究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只要看看近20年出版的文学研究著作的内容和数量,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实。

至于文化研究是否最终会回归到文学研究或审美研究,我想只能由社会文化发展的实践来证实。至于一些朋友的担心,我个人以为是习惯所致。一般说,在思想生活里,人们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产生排他心理,固守自己的学科领域,不愿意接受挑战和冲击。毫无疑问,谁都不会否认传统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的价值,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新的思潮,更不可能让新的思潮倒退。当然,文化研究并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可是,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应该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因此,对待文化研究,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吸收其合理的精华,而不是囿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进行抵制和排斥。

一切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传统的文学研究也在发展变化。以往不被重视的作品,可能会凸现出来;而以前的经典,也可能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例如,19世纪以前,大学不教小说,认为它不是文学,而今天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华裔作家一直不被纳入美国文学教程,但随着族裔文化研究的发展,汤婷婷的作品已经进入课堂。事物的发展变化由多种因素决定,但最主要的是社会发展变化。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兴盛,无疑与社会的发展相关。

当前,资本正在重构积累的特殊空间。由于文化是资本组

织并传播生产欲望的所在,所以资本必然渗透并充斥着文化生产的空间。这就是说,随着跨国资本的发展,文化也将进入跨国化的过程,形成所谓的全球文化;也可以说跨国资本主义将使各种文化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各种文化原有的特点。这些发展表明了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转变,一种时代的断裂,或者说一种后现代的特征。对于这些变化和转变,现在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因为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文化的同一性置于一种新的语境之中。

全球化的出现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它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在文化方面,民族与流行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步取而代之。不过,文化问题分别弥散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可以说,今天的社会已经具有文化消融于经济和经济消融于文化的特征。如果注意一下近些年我国的广告和电视连续剧,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文化和经济折回到社会本身的问题。在几乎所有城市生活的电视剧里,装饰豪华的住宅,私人名牌汽车,以及颇为时尚的衣着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消费意识。而为了获得资金支持,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者,又常常屈从于大企业的利益要求,使文化产品带有广告的色彩。例如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由于获得中国联通的巨额资金,自始至终都使人感到是在为它做广告。因此,在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文化也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

今天,几乎无人怀疑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在发展中也确实出现了许多矛盾或悖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投资,尤其一些支柱产业,例如汽车工业,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有外国的技术和投资,上海的桑塔纳和别克、帕萨特,广州的本田,北京的现代,长春的奥迪和捷达,武汉的富康,天津的夏利,分别与德国、美国、韩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合资生产。这种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资企业,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从中国攫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培养了一批白领阶层或高薪阶层。这些人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仰慕西方的文化时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年轻的一代。于是,许多年轻人追求物质享受。一些大学本科毕业生求职时,开口就要月薪五千;而有些年轻女子,则把汽车和住房作为婚姻的标准。尽管这些只是个别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许多行业,高新科技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机械生产,传统的产业工人大批失业,形成了城市中的贫富分化。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大批向城市转移,进一步加大了城市就业的压力,扩大了失业队伍。由于剪刀差的缘故,农民收入相对下降,个别地方有时收成不足以支付水电和化肥的费用,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偷窃、抢劫、卖淫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贫富和城乡差距的拉大相关。去年,北京曾发生砸车事件(深夜用锤子专门砸豪华汽车,一连砸十几辆),据报纸说,砸车者声称砸车的原因是怀有仇富心理。

经济的变化必然导致观念的变化。当前,消费的意识形态

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的文化或本土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无疑成了众多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正是这种形势,促进了国内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一时的时髦,也不只是追逐国外的文化研究。它与国内外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待文化研究,更多的应该从提高思想认识方面着眼,而不是单从研究对象着眼。那种批评放弃经典而研究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维护少数人的“象牙塔”,而忽视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当前,影视业、娱乐业、广告业、媒体工业以及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正在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心理构成,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做出反应,从时间和空间上作出自己的理论阐述。

其实,就目的而言,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人类社会更加完善。因此两者应该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至于那种说文化研究是“泛意识形态化”的指责,我想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看法;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意识形态几乎无处不在。反对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文化研究仍然方兴未艾。为了给读者提供必要的借鉴,《疆界2》仍然着重选收了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为种族设计形态”,“伦理学是原初性的哲学”和“美亚协会与美国太平洋的帝国主义想象”等侧重文化研究及其理论;而“皮埃尔遭遇的危机”和“野蛮的追求”则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解读麦尔维尔,批判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狭隘主义;“不可通约性的时代”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涉及到认识论、历史、哲学和美学,可以说是一

篇重头文章。“对‘奥斯维辛之后’的再思考”是一篇典型的文化研究文章,但融入了修辞学批评;最后选了一篇“爱德华·萨伊德与我”的回忆文章,旨在纪念刚去世不久的文化研究的先驱者爱德华·萨伊德,文章既富于感情又不乏学理,对了解萨伊德的作品颇有启迪。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这一选本具有丰富的内容,读者如果潜心阅读,一定会得到不少收益。

王逢振

2004 年 1 月

目 录

为种族设计形态,并使之融入族裔性之中:

亚洲裔美国人与白种人性的临界转换 苏珊·考西(1)
伦理学是原初性的哲学;或来自第三世界的蛮夷之语:

恩瑞克·达塞尔访谈录 费南多·戈梅兹(63)
美亚协会与美国太平洋的帝国主义

想象 约翰·埃珀杰西(145)
皮埃尔遭遇的危机:麦尔维尔与

“沉默之声”I 威廉·V. 斯潘诺斯(179)
皮埃尔遭遇的危机:麦尔维尔与

“沉默之声”II 威廉·V. 斯潘诺斯(220)
不可通约性的时代 林塞·沃特斯(255)

对“奥斯维辛之后”的再思考:对大屠杀书写中

不可说之物的修辞的批驳 内奥米·曼德尔(317)
野蛮的追求:E.M. 福斯特《来生》中殖民礼遇的

形成 阿宁迪厄·罗伊(355)
爱德华·萨伊德与我:回忆赫尔

蒙山 威廉·V. 斯潘诺斯(391)
英文目录 (434)

为种族设计形态,并使之融入族裔性之中: 亚洲裔美国人与白种人性的临界转换^①

苏珊·考西

高加索人的意义尽管风行一时,但现在实际上
已被摒弃。

——地区法官施米斯,《偏袒报》

美国梦是以美国黑人为代价的。

——詹姆斯·鲍尔温语,转引自

戴维·黎明,《詹姆斯·鲍尔温传》

白种人性研究,一直有两个主要焦点:阈限性的欧洲人群体(爱尔兰人以及南欧和东欧人)在上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性涌现;白种人性与黑种人性,在美国人的民族身份的建构中的相互构成本质。如果可以揭示出作为未被标记的白种人性的地位,可以揭露出它作为一个种族的范畴的历史偶然性;那么,这样的努力,对这两个地带的白种人性研究,都会起到核心性的作用。^②

其他弱势群体,在白种人性的历史学及社会学里,只是以其不相干的形象出现;因此,也就把黑人-白人的二项对立,作为美国种族形态的界定性的范式,牢固地确立了起来。这篇论文,要集中讨论的是,亚洲裔美国人如何造就美国司法制度中的白种人性框架,进而又如何被这一框架所造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能在白种人性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一个新的探索地带;并且,可以对种族关系的黑人-白人研究模式的依赖展开批判。因为这一模式在上个世纪里,一直使种族政治学的复杂的再构造模糊不清。此外,面对种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大规模重新结盟,如果希望对适宜的应对策略进行阐述,黑人-白人的二项对立的种种理论简化,便会形成障碍。最近出现的这些转变,由于新的移民群体以及典型弱势群体的赞同,业已促成了对作为色盲能人统治的白人特权的再建制;^③而且,以新的全球经济的名义,也已经使对民权运动的收获的重新确立合法化。在全球资本主义时期里,对白种人性的再阐述,在白种人性研究领域之内,突出了另一种重要的范式的限制。此即,依靠对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去理解白种人性种种变化不定的意义。但是,假若脱离开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地缘政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制约之下的全球经济的涌起,如果想完全理解对民权运动的收获的侵蚀,那就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连接,似乎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还一直为人所忽视。对白种人性的研究,如果局限于民族-国家模式,就不能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全球资本,在当代语境中,运用种族的意义,已经加以更改,并且渗透于其中。在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所确定的,从金融到工业、到垄断、再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进展中的,资本主义的第四个划时代的时期里,对种族形成所做的唯物主义的 analysis,没有一种可以忽视得起,跨大西洋以

及跨太平洋的资本线路的一体化所持有的各种含义。亚洲裔美国人(其中大约 65% 是在外国出生),过去一直是对种族身份进行再构造的有决定意义的管道和场所。之所以要推出对白种人性在为亚洲裔美国人的身份的各种意义定形、在亚洲裔美国人群体组合之内及弱势群体之外创造层级化方面所具有的生产力的福柯式的分析,我希望能够突出,研发中介的概念的必要性:它们可以为这一中介种族群体之内出现的共谋以及抵制,提出解释。

建立在工人阶级的与非白人的身份的趋同之上的、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反种族联盟的遗产,已经研发出弱势化的模式,将种族压迫、抵制以及对立意识突出出来。以平行性的弱势化而不是层级化的弱势化为基础,60 年代的种族政治学,断定白人与非白人的地位性质之间存在着对立,并且战略性地延缓对处于这一框架之外的种族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化,借以向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起挑战。不过,继续依赖于这种曾经力量巨大的、转换性的弱势群体研究模式,已经限制了我们的能力,阻碍了我们对曾经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有色人种的战略性联盟奠定基础的联盟理性的崩溃的认识和占用:它的崩溃,在某些政治意味最浓、最具界定性的当代事件,比如说,移民、肯定行动^④、福利改革以及最近的埃里安·岗萨雷斯事件中,戏剧性地表现了出来。因肯定行动的规划遭到肢解而直接受益,白人与一部分亚洲裔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团结了起来,同西班牙裔人以及黑人相抗衡。反移民立法,促使亚洲裔美国人与西班牙裔人携起手来,形成一方;同时又把白人和黑人联合起来,形成了另一方,相互对立。而埃里安·岗萨雷斯事件,却促使白人、黑人和非古巴籍的西班牙裔人联合一致,跟古巴籍的美国

人形成对垒。在弱势群体之内,由于这些事件的出现,也出现了各种利益纷争。保守主义者们急不可耐地抓住这些纷争,大做文章。在他们的词汇表中,所有能够解释并包容这样的再联盟的意义和指向的词,尽管老调难变,但却已是花样翻新。人口统计今非昔比,阶级层级不断转化,新的移民纷纷涌来,全球经济方兴未艾,因而已经造就出了对色盲白种人性的再阐述;并且,在时机许可的情况下,促成了白人同不同的弱势群体之间的机会主义的联合。这种论述种族的新话语,即使是在推出了市场个人主义的某种政治性文化的时候,投射出的也不过是貌似具有包容性的一种模拟物。因为,这种文化,在全球经济的种种必然性的名义下,竟然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内囊实施的切除,也要施以合法化。

这篇论文要探究的是,在上一个世纪里的某些紧要的关节点上,亚洲裔美国人的在场成了可以突出白种人性、黑种人性与亚洲裔美国人性的各种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形式;白种人性为对这种在场做出反应,而进行的临界转换。这一分析,需要对这样一种对中介的复杂理论化:它能够记录,在与白种人性的各种形式及权利要求联合起来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亚洲裔美国人群体所形成的共谋。与此同时,这一分析还要强调,这样的隶属关系,是由主导性群体,运用能够从种族选择的角度去制定生存状况以及机会的权利,生产出来的。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要上拉下打、就高不就低,种种压力,是在一个种族群体若欲提高其移动性、需要另一个种族付出代价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之内产生的。用詹姆斯·鲍尔温简洁明快的表述来说,就是:“美国梦是以美国的黑人为代价的。”与此同时,我要提出,尽管白种人性已经成为民族归属的一种动态的构成性范

畴,但是,白人特权却一直遭到口诛笔伐,迫使它对所采取的形式进行再交涉,以便把它的霸权维持下去。我认为,这样的再交涉,其至关重要的效果是,在论述民族归属、社会差异、经济不平等以及全球性竞争力的公众话语中,为种族设计形态,并使之融入族裔性之中。归属美国(U. S. belonging),最近已经从种族的意义,转化为族裔的意义。这种转变,已经为被建制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新移民的安顿以及白人族裔性的复兴等文化主义的倾向所强化。这一转变显示,在一个跨国的语境中,族裔性这种新的话语,会怎样模糊种族与阶级的各种活动。对亚洲裔美国人在新的种族政治经济里所扮演的角色的辩证分析,对于理解后-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斗争的业已转换的领域,对于为批驳白种人性具有持续的权利而营造战略,都具有决定意义。

这篇论文,联系白种人性的话语同亚洲裔美国人的在场的关系,将焦点集中在三个历史事件上,去分析这一话语的发展。为了对种族的分界线进行重新构造,与此同时即时决定应该怎样对白种人性做出界定,应该怎样把各种亚洲裔美国人以及黑人的身份置于相互联系的位置上,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积极的交涉。

论文一开始,我要聚焦于一种国家建制。因为,它一直最为活跃地对亚洲裔美国人的身份进行描述和系统化,并将其意义情景化于现存的、民族性的、黑人与白人的二项对立这一框架之内。这一国家建制就是法律。我要特别分析,在世纪转折时期,早期亚洲移民的入籍要求,本来是作为为获得像白人一样的公民身份而出价表述出来的;那么,它如何会成为入籍法在种族问题上的规定的一种应变物,而不是——像某些情况下被建构成的那样——某种自我认同的自愿主义行动。不过,入籍法中的

各种条款,还是创造出了这样一个领域:民族归属的欲望,可能是在它的范围之内并且按照它的指向被驱动的。论文这一部分的焦点是,白人公民权利的话语,在营造亚洲移民并使之成为文化异乡客,与此同时根据各种亚洲身份跟白种人性的相对距离来对他们建立分类学,时刻推动着亚洲人群体当中的相互竞争的自我—分化,根据他们适宜于享有公民权利的程度勾勒出亚洲人与黑人之间的等级性的区分——这一过程当中,所具有的生产力。

第二部分的焦点是,密西西比的华裔社团,初来乍到时,在种族等级制度的基础上,本来被归入跟黑人一样的范畴;并且,通过工作及性关系,同黑人联结了起来。为了达到享有白种人性的特权这一目的,他们根据当地白人精英们的要价,快刀斩断自己同黑人的关系,然后再予以重构。他们因势利导,游刃有余,最后大功告成,运用的是什么方法?这样的转换出现之时,正是密西西比的华裔社团本身,从寄居者被转换成某种以家庭为核心的定居者的社团之日。因而,需要加大赌注,扩展渠道,走向良好的教育、宽敞的住房、灵活的社会移动性等白人才享有的特权。^⑤此外,尽管他们在司法上被归入“有色的”这种分类;而且,在这个时期里,为钳制南方的黑人,吉姆·克劳法得到了严格的实施^⑥,但密西西比的华人还是梦想成真,最终使移动性成为现实。我之所以要研究这一社团,是因为黑人跟白人之间的各种分界线,在当时的南方已经最为牢固地确立了起来;而且,种族移动性因为限制最大,其前景似乎一片渺茫。因此,黑种人性跟白种人性之间的讨价还价,意义最是模棱两可。此外,我希望突出说明的是,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只是非公民,但由于人数不多,经济力量则不断增长,所以能够渐渐定位,在种族等级制